

永远的先生史树青

本报记者 付裕



史树青与南开师友合影。后排左起：朱凤瀚、郑克晟、王敦书、史树青、冯承柏、傅同钦、黄春雨；前排左起：王晖、吴卫国、胡妍妍、胡健

无尽的怀念

“史树青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南开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朱凤瀚回忆道：“为更好地传授文物知识，1984年，曾任博物馆专业教研室主任的王玉哲先生经校方和系方同意，聘请史树青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当年的春夏之交，我随王先生去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史树青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在现场，当他得知我正在研究先秦领域，立刻就出了题考我。”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史先生来南开上课时，总会用网兜从北京带来一大兜书，见了老师和同学们就很热情地送书、给书。”朱凤瀚笑道：“只要有空，他就让我陪他跑到天津古文化街的旧书店里去买书。买完以后，他自己也不会留下，全都拿出来送给老师和同学们。”

史树青先生学识渊博、知识广阔，同时，为人特别热情、真诚、平易近人。史树青先生送书的场景，是很多人的共同回忆。

“30多年前，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经常旁征博引。时常会讲到某一本书，来龙去脉，他都知道；又比如讲到一个古人，生平谱系等等，他都知道。经常讲到兴起，他就会说这本书如何好，下次我给你们买一本这样的书。”作为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资深编审孙彦回忆道：“有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随口说的话，不记得他的许诺了。他却会拎着袋子忽然出现，跑来把书送给我们。装书的袋子太沉，他还让我们帮他提，总说要自己拿着，一点儿都没有架子。”

在专业方面，史树青先生知识渊博、功底扎实。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周美芬回忆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写论文时遇到了难题。当时，史树青先生让我去资料室找到什么书、哪一期、什么时候的文章，可以用来作参考。我当时还小，有点儿怀疑，他就这样随口一说，就能够找到吗？后来，我果然就找到了，真是对他非常佩服。”

“后来，我曾经随史先生去苏州丝绸博物馆鉴定文物。非常有幸见证了史先生鉴定文物的过程。”周美芬回忆道：“感觉很多他见过的文物和相关文献都装在脑子里，那时候觉得，他的头脑就像电脑一样，有一个文物数据库，随时把鉴定成果和头脑里面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很快就能作出判断。”

“史树青先生博闻强记。1975年，我听史先生讲荀子的《天论》，可谓是一句话讲一天”。文物、考古、历史，他都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十洲表示：“史先生不仅继承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的优秀传统，同时，遵循‘笃学敦行’，对年轻人非常鼓励、非常谦虚。”

“史树青先生曾对我们说，作为

一位博物馆工作人员，最应该做到的就是读、摸、写。读就是读书，摸就是摸文物，写是写文章。”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刘渤回忆说：“1986年，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毕业实习时，史树青先生常常到我们宿舍小坐，并嘱咐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多摸文物、多写文章。我入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以后，30多年来，这三条要求，一直指引着我前行。”

最好的榜样

1945年，史树青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后入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1947年，25岁的史树青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1949年，担任北京历史博物馆编组组长，1956年，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1982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1983年担任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史树青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在青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碑帖、拓本等领域积累大量实践经验，颇有心得。其主要论著有《湖南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祖国悠久历史的瑰宝》《楼兰文书残纸》《小篆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鉴古一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书画鉴赏》《书画鉴定经验谈》等。

“1984年3月，我们到对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毕业实习，亲眼看到史树青先生对新征集来的一批青铜器进行鉴定工作。史先生旁征博引，对这批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鉴定，其渊博的知识让人叹为观止。”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涂小元回忆道。

跟随史树青先生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实习工作经历，深深地刻在很多人的回忆里。

“1984年7月，我与七八位同学一起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展览筹备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博物馆，史树青先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施琪回忆说：“为什么印象深刻呢？本来说是工作，结果，后来变成了课堂。我们的任务就是分拣文物，为文物做卡片、布展等，有很多书画、青铜、瓷器、玉器，包括钱币等，史先生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给我们讲解。那时，我真正认识到，文物背后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故事。同时，史先生对文物的判断、鉴定非常清楚，非常博学。可以说，他本身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体现。”

谈到文物鉴定工作的生动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陈烈讲述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故事。

“1975年，我们在原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赴日进行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览，特别借调了上海博物馆青铜专家马承源领衔。一天，临近下班，研究员宋曼打来电话说，在清理宝鸡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尊锈蚀时，发现内部底层一角似有铭文。这个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大厅，大家都不走了，在展厅等候。马承源吩咐宋曼继续清理，依他的判断，如果器底一角有字，当是满篇铭文。

一小时后，张明善将两张122字的拓片交到马承源、史树青手中，释文工作随即开始。马承源和史树青分别释文，身后围着好几个人，大家都屏住呼吸，紧张地听他俩怎么说。马承源将整篇铭文的最后四个字‘惟王五祀’释出，释文工作告一段落。当时，史树青先生释出全文，并根据铭文意思，临时命名该尊为‘宗小子尊’，但‘宗小子’叫什么名字，史树青和马承源探讨了许久，都心存疑虑。第二天，他们请李学勤再看，李学勤断出‘宗小子’叫‘何’，至此‘何尊’一名，沿用至今。”

史树青先生对博物馆事业非常热爱，他认为，在博物馆工作非常光荣。他总是在会议上强调，自己是‘研究馆员’，而不是‘研究员’。朱凤瀚回忆说：“我年轻的时候，仔细想过其中的区别，得出的结论是，他对博物馆事业非常尊重，他认为，博物馆工作是很神圣的。”

“从1984年到2000年，史树青先生严谨治学、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阁表示：“史先生的热心和执着，潜移默化影响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可以说，史先生是我们的表率，值得我们学习。”

“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后，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甚至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大都发生了变化。我们都是亲历者，也是实践者。史树青先生这样的文化大家，他的学问和治学之路变成了无法复刻的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导师杨东明表示：“回顾史先生的一生，经历了社会的变革，但在过程中，他的身份一直是专心学术研究的文物专家，这是很有典范意义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主任黄春雨对此同样感触颇深。“我曾经带过两届同学到北京参观博物馆，那时候年纪小，我就把史先生邀请过来讲解。只要史先生在馆里，他就会来。老先生确实是能把文物讲得很通、很清楚、很明白，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史先生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历史文物的感悟，真的可以做到让文物活起来。现在想起来都让我们非常感慨。”

对于国博人来讲，史树青先生就是一面旗帜。国家博物馆研究院研究员胡健表示：“因为同样在国博工作，经常听很多人说起老先生在工作期间的故事，以及为国博建设所作的贡献。史先生渊博的学识，至今鲜有人可以与之比肩。”

“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的先生是分不开的。”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卓表示：“未来要将博物馆事业做得更好，这也是先生希望看到的。”

永远的先生

“在博物馆工作，知识不广博不行，兴趣不广博不行。”南开大学文博校友会会长、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回忆：“史树青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自1947年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直到80岁退休，在博物馆工作55年，因为博学，常有人称他是‘杂家’，但我认为应该称他为‘博学的文物家’，才更确切。首先要博学，专、

精才有基础。”

“开学时，史先生给我买了一本画家辞典，里面有2万多个人名，他让我至少先记住5000个，字号、别号、斋号、祖籍、家世、师徒传承等都要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胡妍妍说：“史先生他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他们的收藏基础都是自小开始的，是浸润式的收藏。史先生通过这些书、画、古籍、善本、碑帖来印证他所学的理论，来研究存在世上的文物，是学有所用。”

史树青在文博界是知名的学识渊博、为人宽厚的好先生。“那时，我经常去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史先生的办公室问学，那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有五六十个人在那里办公，每天人来人往。史先生总是满腔热情地解答各种问题，好像从没被问倒过，起码能告诉来人从什么书里能查资料找线索，也经常当场研墨提笔写跋文。”胡妍妍回忆：“在我看来生僻的人名，史先生随口就能讲出这人祖籍哪里、有什么著作、担任过什么官职等等，博闻强记，我佩服极了。”

史树青先生古道热肠，特别乐于助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回忆：“1987年的时候，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从文物公司征集的文物。这个文物非常漂亮，虽然有铭文，但我们真是搞不懂。思来想去，我就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把这件文物的收集过程和不懂的问题寄给史树青先生。”

“我当时只说我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心里也打鼓，虽然知道史先生很热情，但是写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回呢，我没有那么肯定。于是，我就天天盼、每天去信箱看。”卢永琇说：“很快，大概一周的时间，史先生就写过来一封回信，非常快。来信写了两篇，把他的考证结果告诉我，以短文形式清清楚楚写在卡片上。甚至还说，他有一件事情不是特别清楚，查证以后再告诉我。”

“史树青先生对我指导很多、帮助很大。”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守永回忆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志良旧译‘贝尔氏所藏中国古玉集’》，这源于史先生在博物馆里发现的《中国古代玉器》手抄本。那时候，在博物馆复印很难，装订也不是很好，但后来，我还是依靠这些珍贵的资料，写出了论文。后来，史先生还推荐这篇文章全文发表。”

“我现在还收藏有一封史树青先生写给我的信。那是1993年我写毕业论文时，史先生发给我的材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雷虹霖表示：“史先生特别温暖、特别温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对学生真心给予关爱和帮助。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在我自己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也是切实地真心对待学生，认真地帮助他们成长。”

“文物大家史树青，腹自华采诗书城。桃李芬芳南开园，雄情恣意拥青葱。题词赠我如椽笔，文博往事忆枯荣。历博旧地长相记，落落寒松念此公。”在纪念史树青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教授、校史与地方史研究学者梁吉生，特意作诗以示纪念，表达对史树青先生的深情。

林尔嘉：把大海藏进胸怀

本报记者 照宁

菽庄花园是民国年间在闽南与台湾两地负有声望的人物之一林尔嘉的私人别墅，园主人以他的名字“叔藏”的谐音命名花园。菽庄花园建于1913年，地处鼓浪屿岛的南部，面向大海，背倚日光岩。园内台阁亭榭，结构精雅，园在海上，海在园中，极山海之大观。菽庄藏海，寓意“把大海藏进胸怀”。



爱国济世，明辨是非

林尔嘉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五子陈宗美的嫡生长子，6岁时过继给台湾著名的板桥林家。

板桥林家先祖林应寅于清乾隆四十三年自福建省龙溪县迁居至台湾，后在台北板桥建造“林家花园”，因其家族产业发达，当时名列台湾首富。

1894年甲午战争后，林尔嘉与其父台湾名绅首富林维源坚决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不屑作日本的“顺民”，毅然放弃庞大家产，携眷属回到福建，定居在厦门鼓浪屿，那年林尔嘉21岁。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商部右丞左参议王清穆到东南地区考察商务，途经厦门，看到林尔嘉重视振兴商务实业，关心地方治安，遂向朝廷力荐，林尔嘉于1904年至1907年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宣统三年(1911年)又奉调入京，受聘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

毅然辞官，择善弃恶

林尔嘉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期间，为使国家富强以抗外侮，提出许多改革经济、发展实业的主张。主持制定《土地买卖章程》《华洋交易规约》各64款，推动厦门的对外贸易。他任福建商团总办兼福建商务，大力发展工业、开矿铸银、修建铁路、整理税收、削减冗费，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时，厦门已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中外商旅辐辏，凡地方治安及商民一切正常权利，他莫不竭力维护。当时，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理，十分赞赏林尔嘉才干，聘其为商部顾问。

清朝末年，国力衰竭，清政府拟整建海军，重振国威。林尔嘉慷慨解囊，捐献200万两银子，遂被晋升为侍郎。岂料清政府为庆祝慈禧寿诞，挪用了海军款项修建了颐和园，林尔嘉的夙愿成泡影，于是他毅然辞官回故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

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推林森为议长，林尔嘉被推举为参议院候补委员。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权贵们举荐林尔嘉为福建的代表，请他晋京呈奉拥袁当皇帝的“劝进表”，他却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面对当时的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他洁身自爱，虽军政争相拉拢，他却从不与之同流合污。

林尔嘉的一生虽担任过不少官职，却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更可贵的，是在政坛风云变幻中有着高尚气节，择善弃恶。

通儒硕学，不忘教育

林尔嘉家财万贯，“贵公子”之称名符其实。与同时代的富家子弟有很大不同，林尔嘉既“不染于少年纨绔之习”，也不热衷科举仕途，唯独对学习非常感兴趣，他勤奋攻读，遍览经史，通晓诗赋，并习英文、日文，学识广博。

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饮食起居十分俭朴，而且好善乐施，热心救灾济贫。1908年，福建龙溪、南靖两县水灾，林尔嘉即募银3万两，资助兴修堤坝。

林尔嘉致富不忘教育的美名，在厦门人中广为传颂。林尔嘉向来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认为“改造社会当自家庭始”“女学之宜兴”“不亚男校”。他在鼓浪屿创办了华侨女子学校，任总理兼校长，鼓励女孩读书学习。由他捐资兴建的学校还有厦门同文书院(现厦门旅游学校)、厦门大同学校等。

1905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外国殖民者在此横行霸道，无视中国的司法权。在林尔嘉任租界工部局董事兼董事的14年间，凡关系国体荣誉、华民利害，他总是不断威胁，据理力争，深受华人敬佩。林尔嘉被选举为厦门市政协会会长，连任了4年。

林尔嘉在鼓浪屿建造的菽庄花园，园内有44桥和12洞天等景点，辽阔的海域是它的亭台，隔海的南大武山脉是它的围墙。他在此创立了“菽庄吟社”，与流寓游宦、通儒硕学、骚人墨客、画师棋伯经常往来。著有《菽庄丛刻八种》《古今文字通释》《闽中金石略》《寄傲山馆词稿》《壶夫吟》和《鹭江名胜诗录》等书。在1951年林尔嘉病逝后，其夫人将菽庄花园捐赠给了厦门市政府。

宝 藏 物 语

三国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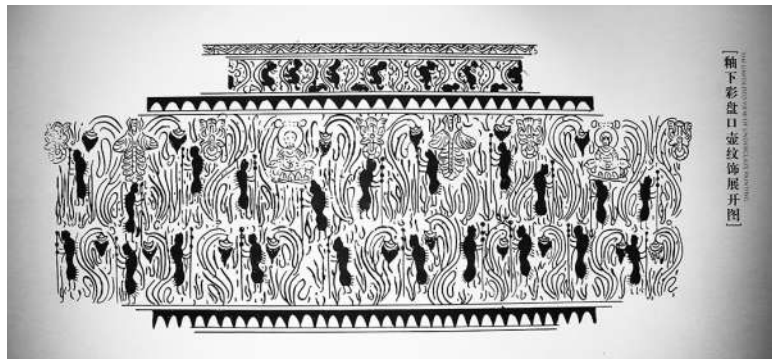
三国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在1983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吴墓，现藏于江苏省南京市六朝博物馆，号称其“镇馆之宝”。

壶为青瓷质，通高32.1cm、口径12.6cm、底径13.6cm，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壶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从纹饰展开图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壶身描绘了多种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羽人、仙草、云气、神禽、异兽、铺首……图案布局繁而不乱，釉下彩画和贴塑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具有独特时代气息、充满神秘色彩的画卷。



青瓷釉下彩



釉下彩盘口壶纹饰展开图